

看庙底沟文化

彩陶的足迹



河南邓州八里岗遗址出土花瓣纹彩陶罐

王炜林

国家文物局近日向社会推介百项2020年度“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彩陶·中华——中国五千年前的融合与统一”名列其中。这个看起来“满目繁花”的原创展览，由国家文物局、陕西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陕西历史博物馆承办，展品来自16个省、区、市36家文博单位，是目前国内博物馆涉及彩陶分布范围最广和最受关注的一次展示。展览以渭河流域彩陶发展为纵向脉络，以彩陶繁荣期为社会为横向切面，对彩陶纹饰“华夏之花”的溯源溯流，勾勒了5000年前中华大地上第一次文化大整合的恢宏历程及深远影响。

彩陶特指烧制前绘彩的陶器。对比强烈的绚烂色彩，意象多元的美好图案，点线面的繁复组合……彩陶不仅是早期先民的实用器具，更代表了那个时代卓越的艺术成就。考古资料显示，在距今8000年的亚洲大陆东西两端率先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彩陶，中国是世界彩陶的发源地之一。作为黄河最大的支流，渭河流域孕育出的彩陶文化，也是世界重要的彩陶文化区之一。这里是彩陶文化发展序列最为完整的区域，从距今约8000年的老官台文化开始，先后

经过半坡文化、庙底沟文化发展，一直延续到仰韶时代晚期，经历了3000多年的历程，成为中华大地上独特的文化景观。

老官台文化彩陶作为中国彩陶文化的根，尽管器形与纹饰较为简单，却意义非凡。半坡文化彩陶纹饰以直线构图为基本特色，尤以鱼纹和人面鱼纹最为典型。庙底沟文化彩陶纹饰繁复绚丽，多以若干相同单元图案对称、重复排列，构成多元连续带状纹饰，尤以鸟纹及由圆点、弧边三角等构成的各种花卉纹最具特色。到仰韶时代晚期，中原地区彩陶开始衰落，数量急剧减少，纹饰趋于简化，但彩陶文化并未落幕，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彩陶异军突起，成为继中原庙底沟文化之后彩陶发展的又一中心。渭河流域彩陶这一发展与传播历程，也是彩陶文化或中华文明本上起源的有力证据。

庙底沟文化时期，不仅是中国彩陶发展的鼎盛阶段，也是中国史前社会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原本经营粟作农业的庙底沟文化先民，在与长江流域史前先民的交流中，发展出稻作农业，使粮食的来源比以前更加多样化。经济的稳定发展为人口的增长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这一时期，聚落数量增多，规模差异显著，出现了作为区域中心的特大型聚落。西安高陵杨官寨遗址就是其中的代表。该遗址规模巨大，总面积超100万平方米，环壕所围区域面积达24.5万平方米，环壕周长1945米。如此规模的超级工程，单靠杨官寨一个聚落的居民是难以完成的，反映出当时的社会已经出现等级分化，具备一定的社会动员能力。杨官寨遗址西门口两侧，发现成层分布的完整陶器，数量达千余件。还发现有其他聚落罕见的特殊器物，如镂空人面器座、陶祖、釜形陶器、玉璧纹彩陶盆、龙纹彩陶钵、盆、石璧、石琮等。杨官寨聚落的布局、规模以及大量独特遗存表明，庙底沟文化时期带有都邑性质的超大型聚落已脱颖而出。

蕴含着庙底沟文化精神的高度统一的彩

陶纹饰和制式化的特征，赋予了彩陶“礼器”的功用。庙底沟文化彩陶向礼器的转变，标志着管理复杂社会古礼已经形成。这种藏礼于器的做法，体现的是礼制。有了“礼”，人们的行为才能有所遵循，社会秩序才可能纳入常轨。正如一些学者理解的那样，彩陶是大时代大文化的代表，是古礼与文明的先声。

庙底沟文化以其独具特征的花瓣纹与花卉纹彩陶为标识，在史前中国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文化浪潮。考古资料显示，在东部大海、西达甘青、北抵阴山，向南则跨过长江、踏遍岭南，直通深圳香港的广袤地区，都发现有庙底沟文化彩陶造访的足迹。在交通尚不发达的时代，庙底沟文化彩陶的广泛传播，反映了深刻的社会背景，显现出庙底沟文化强大的辐射力。周边同期考古学文化对庙底沟文化彩陶的接纳，或许意味着它接受了彩陶所代表的庙底沟文化的行为准则，这在客观上形成一种“文化共识”，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文化融合，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文化大一统格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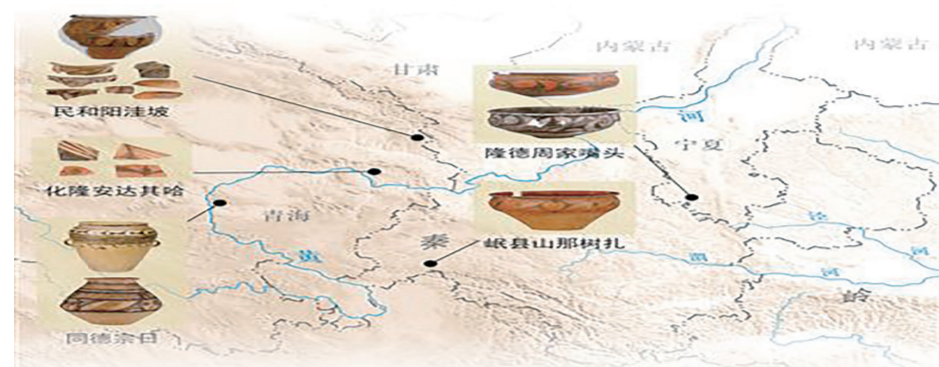
仰韶时代彩陶发展演变过程中，在渭河流域的半坡文化晚期，彩陶的象生图案中出现鱼鸟共体的形象。如果鱼和鸟分别代表半坡文化和庙底沟文化，那么这种共体反映的就是部落的融合。当然，这种融合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除了反映“共和”题材的彩陶外，在关中的一些遗址中还发现了鸟吃鱼或者

鱼吃鸟的彩陶纹样。渭河流域演绎的这场鱼鸟之战，无疑反映的是中原古代文化核心区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的历史。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庙底沟文化彩陶的分布范围，与《史记·五帝本纪》所载黄帝“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的区域高度重合。传说中的炎黄集团整合后，形成了古国联盟，并且迅速将势力向更大范围扩展，因此在中原以外的区域也常常可以看到庙底沟文化风格的彩陶。这么大的疆土，只靠征伐显然是不可持续的，还需要统一的文化认同，彩陶或许就是实现这种认同的载体。

半坡文化彩陶鱼纹与庙底沟文化彩陶的鸟纹都经历了由具象到抽象的发展过程，并最终发展成两种花卉纹饰：一种是相对具象的四瓣式花瓣纹，一种是较为抽象的花卉。考古学家苏秉琦将后者称为菊科和蔷薇科，认为它们就是华夏之花。无论如何，两种文化彩陶纹饰最终的趋同，分明显示出各部落文化的支流汇合为华夏文化的历史痕迹。

仰韶时代的彩陶“物化”了5000年前中国先民们的心灵，折射出那个时代的精神，在推进早期中国文明化进程中扮演过重要角色，也今天的我们与历史对话搭建起桥梁。这笔丰厚的文化遗产，值得我们传之久远。



庙底沟时期彩陶局部分布图



陕西姜寨遗址出土鸟鱼纹彩陶葫芦瓶及纹饰展开图

核心阅读

仰韶时代的彩陶，“物化”了5000年前中国先民们的心灵，折射出那个时代的精神，在推进早期中国文明化进程中扮演过重要角色，也今天的我们与历史对话搭建起桥梁。这笔丰厚的文化遗产，值得我们传之久远。

嘉应观：一部浓缩的中国治黄史

王丁 桂娟 双瑞

从洛阳沿黄河继续向东，行至黄河中下游分界线桃花峪附近，在河南省武陟县境内的黄河北岸，邂逅“万里黄河第一观”——嘉应观。这是黄河流域修建的最大的一座河神庙。

“武陟地处悬河口、百川口，历来是治河的关键要地，是了解中国治黄文化的窗口。”嘉应观景区管理局书记崔峰介绍，雍正之前的历史上，在武陟境内沁河入黄处，沿黄河9公里多没有大堤，水流迁徙不定，成为最易决口的“豆腐腰”河段。

“河涨河落维系皇冠顶戴，民心泰否关乎大清江山”，嘉应观内的御碑亭柱上刻着康熙原话。自大禹治水以来，中国历朝历代都没有停止过与黄河水患的斗争：“黄河宁，天下平”——道尽了黄河与国家民族命运的关联。

黄河孕育了灿烂的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母亲河。但是，历史上，黄河是中华民族的心腹之患，它在广阔的中下游平原造成“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给沿岸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据统计，在1946年以前的2000多年里，黄河决口泛滥达1593次，较大的改道就有26次；沿岸几乎每一个带“口”字的地名，都是水患灾难的见证。

嘉应观始建于1723年，是雍正为了纪念在武陟修坝堵口、祭祀河神、封赏治河功臣而建造的准黄诸河龙王庙，建筑布局效仿故宫，集宫、庙、衙署为一体，观内有雍正亲自撰文并书写的铜碑，立在一河蛟身上，意在镇恶。

在此之前两年间，黄河先后在武陟4次决口，洪水经卫河入海河，直逼京津。洪水挟带的泥沙还淤塞了大运河，导致运粮困难，一时朝野震动。曾随康熙巡河的胤禛（即后



来的雍正)被委以重任，负责指挥决堤堵口。

“期间胤禛许诺，若堵口成功，就在武陟修建一座大小河流的总龙王庙。继位第一年，他履行诺言，取名‘嘉应’，是‘嘉瑞长应’之意，表达对海晏河清的企盼。”崔峰峰讲述。

穿过祭祀大禹的禹王阁，来到东西两侧龙王殿。这是嘉应观的精华所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殿内供奉的龙王不是神仙，而是提皇时的历代治河功臣，把人升格为神来祭祀。

西汉的贾让，在黄河第二次大改道后不久，应“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之诏上书，提出著名的“治河三策”，被史学家以千余篇篇幅完整记入《汉书》，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东汉小吏王景，主导修筑了千余里黄河大堤，并通过“十里立一水门”的方法实现洪水分流，成就了黄河安流千年的传奇。

元代河官贾鲁，史无前例地在洪水期

开工治河，只短短90日，不仅消除了黄河北泛对京杭大运河的威胁，还使河南南流所经的汴渠、淮水等恢复故道，舟楫通行。如今，河南境内仍有“贾鲁河”，纪念其功绩。

和王景、贾鲁一样，禁烟英雄林则徐也供奉在龙王殿里。他曾负责河南、山东两省黄河事务，衙署就在嘉应观。鸦片战争失败后，林则徐被发配新疆途中，正遇黄河决口，虽百病缠身，他仍抱着“亿民重生身家轻”的信念，改程到开封组织堵口。

一部治河史，就是一部治河国史。小小嘉应观，让人穿越时空，纵览中华民族坚韧不拔、坚强不屈的奋斗史。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黄河治理，黄河不仅实现岁岁安澜，而且连续21年不断流，呈现出全新的生命状态，为世界江河治理与保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了成功范例。

弥渡彝族服饰：

凝固的历史

余述祥

华丽端庄的弥渡彝族服饰，那是岁月刻下的印痕，凝固的历史。

彝族是大理白族自治州弥渡县的世居民族，主要聚居在弥渡境内的清水沟、金岗、高坪、多姑、瓦哲、五台山等6个彝族村委会和最南端的牛街彝族乡以及散居在红岩镇的理卫、吉祥、大营、新街镇的西河、新胜、德直乡的青云、太平等地。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弥渡彝族和周边民族不断融合，最终形成了今天丰富多彩的文化形态，而这个过程在他们的服饰之中可见一斑。

服饰作为一种文化载体，是凝固的历史，是穿在身上的历史，是研究历史、文化的珍贵资料。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变迁，某些服饰传承到今天，它所积淀的文化功能，似乎已渐渐消逝，但在弥渡彝族地区，在节庆、婚嫁娶等场合，还可以发现穿着彝族传统服饰的群众。

弥渡彝族服饰继承了彝族先民服饰的种类繁多、色彩纷呈的风格特征，还有性别、年龄、盛装、便装、婚嫁的区别。作为一种物质文化，它集中体现了弥渡彝族的社会特点、历史文化、生活环境和宗教信仰等文化内容，是彝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像其他文化现象一样，彝族服饰文化的产生、演变、传承，也有它的理由和特点。尚可在彝家女的一针一线中窥视到彝族传统服饰文化的点滴原貌，透视那深藏的彝族服饰文化内涵。

弥渡县彝族服饰以头饰、耳饰、颈饰、胸饰为多，尤以头饰最为丰富。彝族妇女腰际佩戴挂包，包面精饰各种纹样，衬以不同包布缝成，上端开口，下缀五色飘带，挂于腰际，实用又美观。腕饰以金、银、铜、玉、石质手镯，戴金银或石料镶金银马鞍形、猫眼形戒指。还佩戴金、银质链、锁、坠等头、胸、背饰。

弥渡彝族妇女一般穿绣花小领斜襟长衣，外罩彩布绣花坎肩，系绣花围腰。两袖口由红、黄、橙、蓝、白、绿、黑色彩布圈装饰，这些彩布圈，具有不同的象征意义，分别代表土地、青苗、茅草、雨露、花草、太阳。但由于居住地的不同，各地服饰也不尽相同，分为：西山区清水沟、金岗、石甲、高坪、西河、理卫等地，男子头顶毡帽（又称毡窝），穿大襟衣、大裆裤，赤足或穿草鞋，披羊皮，外出背皮袋（现已基本消失）。女子裹高包头，额上饰银桂花、衣为布襟，外套无坎肩，腰系大围腰，大围腰左右下三边缀五色花，为动植物图案，足穿绣花凤头鞋，用本地产绿布条制裤子，不锁脚边，腰间背圆形白毡裹背，所穿服饰颜色鲜艳、质地厚重，尽显远古南诏皇室服饰遗风。小男孩戴虎头帽。小女孩戴鱼尾帽。未婚少女不梳高髻，发辫从帽下垂于背。



朵姑、瓦哲一带妇女戴黑布做的额带，其形如倒写的“丁”字，打蝴蝶包头。瓦哲一带不梳高髻，只以包头盘发，黑布围上缀银桂花，腰扎绣花围腰，身穿绣花圆裹背，足穿“花云子鞋”，鞋面上用彩色丝线绣成各种花卉，鞋尖饰彩色短穗，鞋后跟接三指大小的小红布溜跟即成。传统的男子服装是内穿镶着宽边的对襟圆领黑衣裤，外套绣花或彩布坎肩，腰系绣花带，头戴织锦镶边的具有装饰作用的“盖盘帽”。少女额前戴的额带叫“箍儿”，白布绣花做成，上沿连几束彩线短穗和几个小铃铛。

牛街地区彝族女子的服饰显华丽之美，“迷撒撒”彝族女子服饰显简约之美。裹包头、盘发、额前钉银桂花，穿红衣绿裤，胸前蒙大花围腰。妇女花袖衫上面套有黑色、紫色或镶边的蓝色坎肩，腰系白褐或蓝绿布带，带的两头有花、鸟、虫、蝶、彩云等刺绣或盘线的花纹图案，通体绣满精美图案，可谓“浑身是彩，通体皆花”。

弥渡西山一带彝族已婚女子结发髻，发髻呈宝塔状。发髻上戴“别子”，发髻外包裹黑包头，包头上有银串珠和亮球装饰。上衣领和袖、襟、镶上多层色彩鲜艳且样式不相同的金银丝瓣或绣纹纹样。上衣外罩齐腰蓝布短领褂，领口饰有由7个银鼓钉拼成的5个叶子，彝语称之为“披巴”。领褂四周用银鼓钉镶边，共4排，每排36颗，一件领褂有200多颗。胸前佩戴银质“三须”针筒，“菱角吊”和鸡心形绣花荷包。腰间系围腰。背背直径一尺左右的圆裹背，上绣两朵太阳花，一大一小，对称排列。鞋是勾尖绣花鞋，船形或凤头形。

弥渡南山（牛街）彝族妇女头饰创造性地运用了既能遮光挡日，又有装饰作用的“盖盘帽”，体现了彝族的智慧和智慧，再加上造型各异、银光闪闪的外观，往往给人一种神秘莫测之感。

弥渡彝族好赛装，每逢婚庆嫁娶、赶集、集会都要比一比穿戴。每年农历正月十五铁柱庙会彝族踏歌会，那是赛装高潮，踏歌会上，来自于弥渡彝族聚居地的各村寨的男女老幼穿戴整齐，云集在铁柱庙，这里便形成了五彩斑斓的彝族服饰的比赛场。每个彝族妇女的头饰就是她心灵手巧的见证。

（作者单位系弥渡县文化和旅游局）

大雨 断碑 爱情

——明代崇真宫龙纹碑的故事

冯维健

“这块深埋地下的明代石碑，终于露出了庐山真面目，为讲好大运河故事再添亮点。”河北沧州兴济博物馆馆长顾维新说，如果不是这场大雨，我们很难知道，馆藏的一通古代断碑，是明朝皇帝“敕諭”之作，其背后是一段传为佳话的爱情故事。

今年7月31日，当地下了场大雨。雨后，村民张财源出门办事，刚好路过老邮局旧址，看到了被大雨冲出来的龙纹碑首。“去年改造步行街，拆掉了老邮局，现在正准备盖楼，地基挖了一层土，这里落差大，藏在地下的石碑就被大雨冲出来了。”张财源说。

沧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文物保护研究中心负责人郑志利介绍，这块龙纹碑首为汉白玉材质，雕刻着盘龙花柱，额题篆书“敕諭”两个大字。碑首下方尚留小部分碑身，最左侧能清晰辨认出“弘”字，经鉴定距今500余年。

这让人们想起，2013年，河北沧州市兴济镇建国街在修建排水管道时，工人在兴济镇老邮局旧址门前发现一块古代断碑。两年后，当地成立兴济古文化研究会，将此断碑及散落民间、年代久远的其他石碑一起收集保存。2019年，又将断碑运至兴济博物馆修复展示。

经专家比对，这块龙纹碑首与2013年兴

济镇偶然出土的断碑基本吻合。二者宽度均为95厘米、厚度均为30厘米，且都为汉白玉材质，碑身文字皆为楷书，字号大小相同。断碑上刻有“治十五年二月二十六日”“中官”“崇真宫”等字样，与龙纹碑首上的“弘”字正好前后连接，成为史书记载明孝宗为皇后张氏在家乡敕建崇真宫的有力证据。

兴济以“兴复王室，兼济天下”而得名，位于京杭大运河岸边，自古就是重镇要地。明孝宗皇后张氏是兴济人，数百年来，兴济以皇后故里闻名。

历史上，明孝宗是明代的中兴之主，他励精图治，开创了“弘治中兴”的局面。他还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模范丈夫”，和皇后张氏非常恩爱，终身没有纳妃。

史料记载，明孝宗在位18年，独宠皇后，对皇后一家格外优厚。明嘉靖《河间府志》记述，明孝宗弘治十一年（1498年）四月十二日，孝宗皇帝派司礼太监李荣、内官太监李兴、河间府知府高铨到兴济督工敕建崇真宫。

“崇真宫的建造，在500多年前是一件盛事。”顾维新说，明弘治十一年四月，京杭大运河边正是柳绿花红的时节。兴济码头上，来自北京房山的汉白玉石材、河南洛阳的青砖和各地的木料经船载水运送到这里。由于崇真宫是皇帝下诏敕建、国库斥款建设，所以建筑工程浩大，各地能工巧匠汇聚于此。



崇真宫分前、中、后三大殿，《兴济县志书》称它“规模宏丽，冠绝一时”，成为运河岸边一座富有皇家气派的辉煌建筑。

“这块龙纹碑为我们讲述着丰富的明代故事，是大运河沿岸发现的重要文物，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对推进大运河文化研究和中国古代建筑研究具有积极意义，为进一步研究明代政治文化及风土人情提供了依据。”郑志利说。